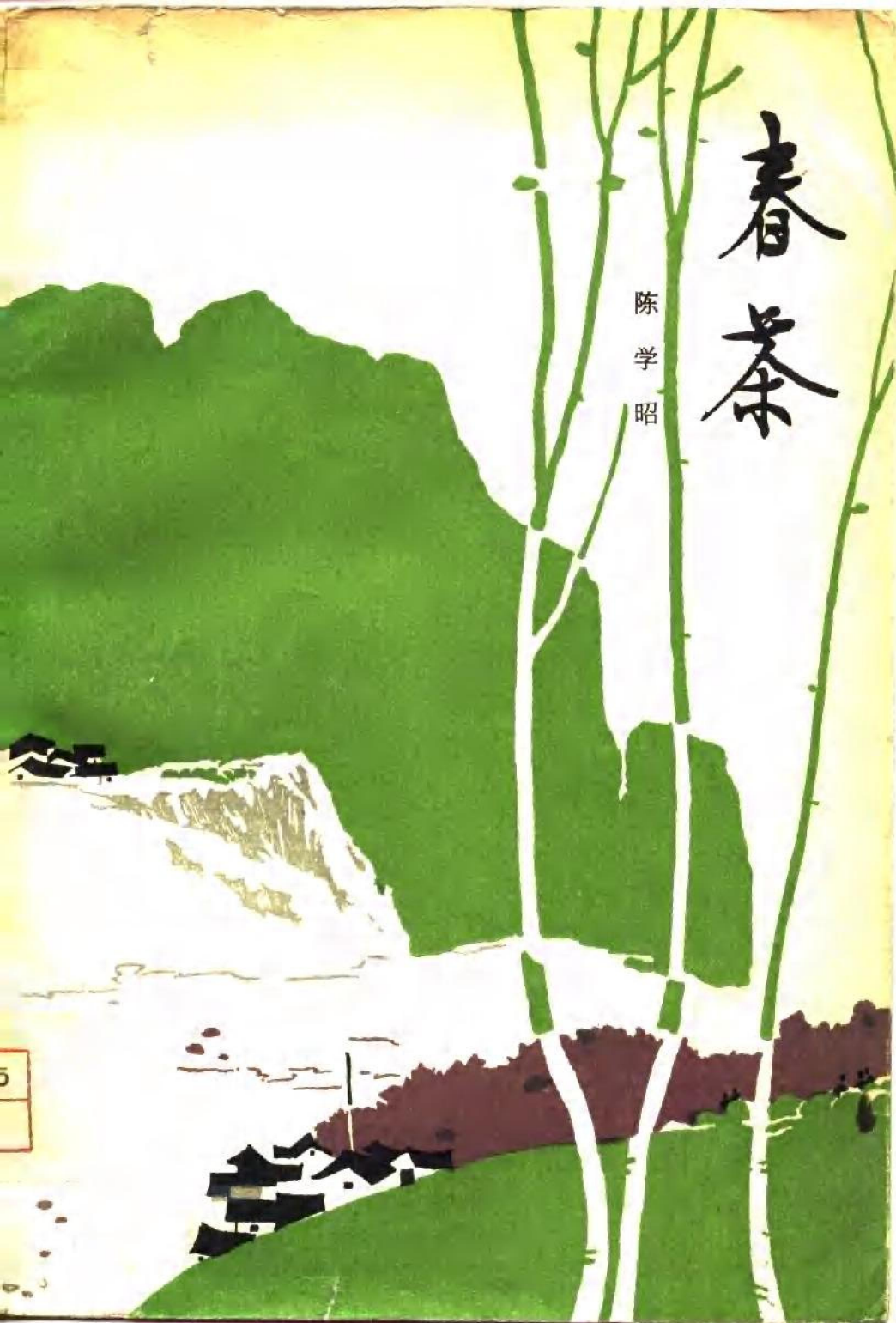


春茶

陈学昭



春 茶 陈学昭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71,000

印数：1—30,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01 定 价：1.02 元

内 容 提 要

《春茶》，是一部描写我国著名的“龙井茶”产地——浙江杭州某茶区人民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这一阶段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狮岭村为中心，描写农业社的诞生、巩固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曲折，以及茶区人民怎样和那种不关心群众利益，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小说还反映了狮岭村和杨岭村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着力表现了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茶区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击退了阶级敌人和投机私商的猖狂进攻，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勇往直前！

作品努力塑造了沈大达、沈瑞珍兄妹和赵小毛、唐开祥等先进农民的形象，并通过对前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杨达生、杨达祥兄弟的蜕化变质和富裕中农黄厚福一家所走的不同道路的描述，比较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及各种类型人物的不同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品文笔朴素、清新、细腻，乡土气息浓厚，有如一幅幅淡雅的素描，展现出江南茶区的瑰丽画面。

写 在 前 面

我只不过想用朴素的笔，写下一点在这时代中我生活着的、见着的和感觉着的东西。

希望读者不要费心去猜测西湖区是象征哪一个西湖区，狮岭村是象征哪一个狮岭村，杨岭村是象征哪一个杨岭村，某人象征某人等等，这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也完全不是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意愿。

陈 学 昭

春天总是给人们以期待和希望。可是，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却来得非常迟。整个冬季既漫长，又寒冷。一遭大雪接着一遭大雪，一遭西北风接着一遭西北风，把这江南美丽的一角——杭州郊区的山岭土地，冻得象石头一样的坚硬和结实。

狮岭乡狮岭村离杭州市约二十多里地，位于西湖的西南角，隐没在丛山峻岭中，是杭州郊区出产著名绿茶的一个村子。村子里二百八、九十户人家，都是依靠经营茶叶为生。一条银链似的泉水从东到西，从山上到山下把大家弯弯曲曲地联结起来；就是靠北面临着泉水支流居住的几户，也是贴得紧紧的。人们不是同姓同族，便是世代表亲，不是对面邻居，便是前后隔壁邻舍。只有很少很少的几家杂姓，本来是外来户，若干年若干年以前逃灾荒、做长工而来到这里；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以后，就安居下来了，完完全全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人。

刚过了春节，村里人带着迫切的心情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天气却仍然是又寒冷，又阴冻。

这一天，狮岭互助组组长、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沈大达，大早起来，抹了一把脸，吃了两碗泡饭，叮嘱了胞妹瑞珍几句话，就赶到村子西口，等着组里两个生产队都出来了，匆匆忙忙地找着两个生产队长说了几句话，生产队向西口六和塔浙江师范学院那边去挑肥料，自己便折回村里，向东头山脚下走

去。

是个阴冷的天，太阳淡淡地透出南高峰的顶，沈大达迎着料峭的晨风，往区委会的大路上走着。前几天，他托乡里转送给区委会一个条子，说希望能够约个时间叫他到区里去一次；他觉得有些话非自己去当面说，才能说清楚。昨晚，乡里带来口信，要他今早到区委会去。沈大达整夜没有睡好觉，翻来复去地想着许多事情；后来，昏昏沉沉地好象正走到一座高山上，谁知一只脚踏在光溜溜的石头上滑了下来，这样，沈大达猛地跳醒了，却原来是一个梦。于是，想着想着，再也睡不着了。沈大达很想点起灯，把几件要紧的事和几句要紧的话记在日记本子上。这样，如果忘掉了，可以拿出本子来看一看。这是他自从担任党支部书记和互助组长以后常常做的。可是，他又怕把隔壁房里的瑞珍闹醒了，只好还是躺在铺上想了又想，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光睡着了。等到突然听到“咿呀”一声门响，睁开眼来，天已有些亮了，光线透过嵌在木窗上的一块玻璃，照到他的床头。沈大达跳起来，穿上衣服走下楼去，瑞珍已经把泡饭烧好了。

这时候沈大达走在路上，心里想起了很多事情和很多要说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想着想着，心里是那么激动，甚至七上八下地、剧烈地跳着。

“先说哪一件事呢？先说今年茶叶都被冻坏了。”沈大达的脑子里映出了一幅令人难过的画面：茶叶整棵整棵冻坏了，几家组员的女人坐在茶蓬边无声地哭着。接着，一个生气的念头起而代替了这令人难过的画面。他想起前些日子区里派人来叫他动员村里的茶农，用一堆堆木炭火在茶蓬旁边烧，这样来解冻。一想起这个指示，沈大达的脸涨得通红了，引起了一种抗拒甚至是愤怒的思想：“这是什么样的指示呵？！竟不想想这

是可能的么？木炭要多少钱一斤呀？再加上人工，茶叶将达到多高的成本！自然，坐在办公室里烤火的人是想不到这些实际困难的……”接着，沈大达又埋怨起自己来：“总之，这是一次教训，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该怪自己事前没有想到；如果早想到，那么采完四茶以后，在茶蓬上包些稻草，盖些稻草，就不会冻成现在这样了！”沈大达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迈开大步尽管往前走着，抬起头来，望见了区委会的三层楼红瓦的屋顶——好象图画里的屋子，从一片雪松和竹林里透露出来。

“不是的，不能先讲这个。”沈大达把正在责备自己的念头赶掉，重新考虑着到区委会应该谈些什么，“先讲哪一件事呢，……就讲黄厚福互助组和我们并组了，我们大家要求办社……”于是，沈大达又想起了这两天来几家贫农组员再三叮嘱过他的话，特别是赵小毛老头子的话：“你呀！不要闷声不响，你是替我们大家说话……”沈大达觉得浑身很热，解开了灰布旧棉袄的扣子，可是他那黝黑的椭圆形的脸孔上，有一层油脂似的赭色，额角上还留着汗珠。沈大达的思想一时显得非常混乱。

“是的，就是请求批准办社，那么茶叶遭受冻灾的事要不要说呢……”

走进区委会的大门，沈大达向大门右手的传达室里望了一下，传达室里没有人。他站在廊上，正迟疑着，楼梯上下来一个穿蓝制服棉衣裤的年青人顶头问他：“找哪一个？”沈大达回答说：“找区长！”

“区长在楼上办公室里！”那人示意了沈大达一下；沈大达便上楼去了。

推进区长办公室的门，区长和一个穿淡黄色棉军装的同志坐在对着窗的一张双人沙发上。炭盆里有四、五条红透的炭

火。穿军装的同志正在和区长谈着什么，看见沈大达进来，微笑了一下，就对区长说：“好吧，就是这样吧！”接着立起身来。

“没有什么要紧事。”区长一边招呼沈大达，一边笑着挽留那个穿军装的同志，但那同志还是伸出手和区长握了一下，走出去了。

“坐吧！”区长——同时也是区委书记，对还立在门口的沈大达说。

沈大达走到区长的写字桌边，移过一只木椅子，坐了下来。

“怎么样？”区长问。那瘦长而黑黑的脸孔，突然变得严峻了，没有了刚才的笑容，眉毛也皱了起来。

沈大达整个身心都紧张起来了。区委书记的脾气，这几年来沈大达虽然和他见面的次数不太多，但从工作中和不多的接触中也已知道个大概。“怎么样”这一句开场话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区委书记不欢喜听人讲话，常常不等人讲完，他就要教训人，打断别人的话；他欢喜听好事情、好消息，而不欢喜听人说困难。沈大达在脑子里搜索着，心里想着，应当说一些最重要的话，那么即使被打断，也不至于使今天白跑一趟。

“黄厚福互助组和我们并在一起了，”沈大达终于开始说，“我们大家都想办社，请求区里批准呢！”沈大达说着，望了望区委书记，觉得关于用木炭解冻等等，都是很清楚的事情，不值得谈了。

“你不去动员大家准备春茶，只是想办社。并组已经很好了，办一两年互助组积些经验再说吧。真是年青人，急躁冒进！”区委书记挥了挥手，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互助组已经办了四年啦！”沈大达简单地说，带着一种

显然不能掩饰的不快。

“你们那个算什么互助组呵！十二、三户贫农凑搭在一起！”区委书记带着一种做结论的肯定口吻，可还是微笑了一下，这微笑使沈大达特别感到难过。

“黄厚福组是有底子的，你们把他们并过来该不是想占中农的便宜吧？”区委书记接着说。

“这……这个从哪里说起呵？”沈大达心里简直有些忿然了，“我们组里有的组员还不要他并到我们组里来呢！……”

坐在靠墙的单人沙发上的妇女主任，接连打了两个呵欠，一双脚在炭盆上伸起又搁下，显出不耐烦的神色。

“还是回去！好好准备采春茶吧！”区委书记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沈大达心里感到一阵失望，在失望中夹杂着气愤，显然觉得话已经谈不好，也不想再谈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区委书记和自己的思想是离得多么远呵！

沈大达一声不响地立起来，区委书记也没有留他，看着他走出门去时，说：“把春茶准备工作做好，且不忙办社！”

出了区委会，沈大达怀着懊恼的心情回到狮岭村来。“怎样和组员们说呢？大家多么盼望着带回去好消息哩！”在遇到这些困难而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沈大达总要想起解放前和解放后自己所遭遇到的一切。在十一岁那年，四岁的妹妹不留心踏断了地主竹园里的一棵笋，父亲被地主叫去，非要赔偿一棵活笋不可；父亲跪在竹园里跪了一整夜，也没有能把笋接活。父亲回家来，把母亲和妹妹哄到屋子外边，在屋子后边的山脚下吊死了。从那时起沈大达就不能够继续读小学，回到家里象一个大人似地做起活来。父亲死后不久，母亲接着又病倒了，由于没有钱请医吃药，拖了一年，母亲竟死了。那一天黄昏，母亲把

他和妹妹叫到床跟前说：“我管不了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吧！大起来不要忘了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怎样死的！”半夜里，母亲就断了气。

埋好了母亲，他和妹妹被赶出了家，地主把他家仅有的一点茶地和一楼一底房子都收了去。地主对他说：“算我倒霉，把你这点茶地和破房子算利息还不够！”父亲死后，因为没有钱办后事，只得把茶地和房子都抵押给了地主。

漫长的战争年月，侮辱、饥饿、苦难的日子，兄妹俩好象一对乞丐，这家那家，在村子里讨些零活做，夜里睡在村口总管堂的泥地上，下边铺的是草，身上盖的也是草。

翻天覆地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到了，共产党来了。接着，一九五一年初春，村子里进行了土地改革。

想到这里，沈大达想起了自己的入党经过：是抓特务的那夜以后，次日下午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子弹和子弹片已经取出，伤口也已包扎好。土改工作队队长——乡的党支部书记张星同志来看他，坐在他的床头，对他说：“支部已经通过你的入党申请了，现在就等区委会批准。”张星同志接着说：“做一个共产党员固然是光荣的，主要的却还是做了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的责任加重了。不要以为加入了党，什么事都容易做了，还要学习，还要锻炼……”沈大达每次想起张星同志这几句话，就好象增加了许多勇气。是的，还要学习，还要锻炼，什么事都不是容易的。于是，他又想起了从土地改革后组织起来的互助组，这几年来所遭遇到的困难。

“不批准也没有什么，”沈大达想，他劝慰着自己，“不批准，我们也还可以办！”虽然这样，可是想起区委书记，心里还是有些不愉快：“乡里同志常说区委书记专门管城市工作，农村工作不熟悉；既然不熟悉，那又为什么不调查调查、

研究研究，却又要来出主意呢？”

沈大达已经下了鸡笼山的山坡，望见了隐没在半山腰树丛中的自己的村子，又想起了互助组、生产队：“不知道他们往师范学院挑来了多少肥……”看看那淡淡的太阳已经照满了山岭，时间该已近午了。“吃过午饭，先去看一看山上的肥料窖，乘便看看山顶上的茶蓬，再呢，同组员们一起挑肥料去。到晚上再同大家谈办社的事吧。”沈大达给自己安排好了下半天的工作，心也安定下来了，于是加快脚步，一径向狮岭村走去。

二

沈大达的家是在村子的中段，高起一点的地方。这一段都是姓沈的人家居住着，人们便把这一段地带叫做沈家岭。

这一楼一底房子，是土地改革后分到的。楼上隔成两间正式小房间，后面拖一间小小的阁楼；楼下一间堂屋，后边是灶间和楼梯间；灶间后面，有一块豆腐干大的院子。他们自己原来的房子，地主叫两个长工徐金彩和赵小毛住着，保管茶叶；土改后，就分给了那两个长工。

这天，沈大达到区里去后，沈瑞珍收拾好碗筷，打扫了堂屋和灶间，烧了一锅猪食，喂过了一只猪，又喂了两只鸡。接着端过一脚盆脏衣服，移了一只采茶的小凳子，在堂屋的门边洗起来。

瑞珍一双手洗着衣服，心里却挂念着哥哥和组里的事：“不知道批得准批不准呵！”抬起头来望了望天空，淡淡的太阳穿过斜对面农会办公屋子的顶，照在自己家门口的路上，

于是带着愁闷又想起了茶叶：“天还不暖和……”突然，望见黄厚福的儿子黄狗儿正走上坡来，对着自己的家门看；沈瑞珍低下头，只顾自己洗衣服。她有心躲开狗儿，却到底不好意思立起来关门。

黄狗儿在十一月底回到村子里来，人们传说着他是因为城里的汽车修理行进行整顿时给解雇了。黄厚福夫妻俩却对人说汽车行里太辛苦，儿子身体不好，回家来休养休养的。狗儿回到家里，正逢着村子里展开学习粮食统购统销和国家总任务；接着，父亲的互助组酝酿和狮岭互助组并组。

狗儿刚回家来，整天郁郁不乐，心里象有一股发不出来的闷气：“真倒霉，生在这深山岙里，一年到头看不见别的东西，只有茶叶！”黄厚福看见儿子回来，心里有些不大高兴，但也是恨铁不成钢，爱儿子心痛儿子多于怨恨。至于黄厚福女人，根本就不怪儿子，看见儿子回来了倒觉得蛮好，并开始想着另外的主意。她觉得一辈子只生一男一女，女儿呢，怎么好，也总归是别人家的人，夫妻俩都已经出了四十头，自己身体又不好，常年不是头痛，就是腰痛，狗儿要能在自己跟前守着，讨一房媳妇，多少总能帮帮家务，这样，也算完了一件心事。因此，只怕儿子闷出病来，总是顺着儿子的心意，好象款待一个客人；如果黄厚福自己不去城里，那么黄厚福女人就东托西托地去托进城的人家带点肉，带点鲞给儿子做下饭的菜。

狗儿在家里闷了几天，开始觉得无聊乏味。父亲和妹妹白天忙着做活，晚上忙着开会；狗儿和母亲两个人在家里，只听着母亲唠唠叨叨说些家务和邻舍的事情。狗儿听多了，觉得有些厌烦。

吃过夜饭，狗儿照例躺到放在堂屋靠壁的一张长的藤椅上去，因为这时候上楼睡觉到底太早了。他伸了个懒腰，叹了一

口气，简直不知道把自己怎样安排才好。

“你呀！”狗儿的妹妹月英从饭桌边立起来，笑着对哥哥说：“我看你懒得连骨头都快要生锈了！我说呢，别的事情不做，会总可以参加参加，就是自己不说，听听也好。不如同了我去开会吧！”

狗儿打了一个呵欠，并不是由于瞌睡，实在是太无聊。冬天的夜是长的，躺在铺上睡不着，一双眼睛巴巴地尽盼着天亮。“也罢，不如跟月英出去看看，譬如闷在家里，一样没意思！”

“我这两天给组里每户人家算细账，算得头昏脑胀，你实在嫌没事做，明天帮我算账去吧！”月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在枕头边拿了个手电筒，又把钢笔灌上些墨水，走下楼来对哥哥说。

“算那个有什么意思？”狗儿从长藤椅上起来，说。

“怎么没意思？我们把每户人家的收入、开销、劳动力、茶叶成本都算出来，那么我们办初级社时定土地股金才有个数。”月英说着，一边向门外走，一边招呼着父亲：“我先走了！”又喊着在灶间里收拾的母亲：“妈妈，我走啦！”黄厚福不出声。黄厚福女人自言自语地说：“办社，算细账，真巴结！比读书还巴结！”可是月英并没有听到。黄厚福夫妻一心想女儿能够进城读中学，却没有料到月英在这个夏季竟然考不取。夫妻俩都希望女儿在家里温课，明年再考。黄厚福女人常常对女儿说：“你不是采茶叶的命！”也常常对别人说：

“我们月英不是采茶叶的命。”黄厚福女人觉得这山岙里日子太苦，自己生在水边，却又嫁到山里，可不能再让女儿过这种日子了。多读几年书，嫁个城里人，城里怎样总比乡下好。出门有三轮车、公共汽车坐；喝水有自来水，只要用手一开就

来，用不着去挑、去提；夜里呢，电灯光象白天一样的亮，不象这煤油灯，又贵又暗，每天还要擦灯罩。但是看女儿并没有非考学校不可的意思，从秋茶以来，帮助组里做会计记账，也上茶地里采茶，现在并了组酝酿办社，她又忙着帮大家算细账了。黄厚福女人心里很不高兴，却又骂不出口来。

狗儿跟着妹妹走出门去，一边说：“你可不要叫我说话！”

“哪个人强迫你说话呀？你不说就不说好了！”月英回答说。

从这晚起，狗儿常跟了妹妹去开会，有时是大会，有时是小组会，有时是青年积极分子会……开始，人们也没有怎样注意他，有时狗儿坐不住，没等会开完就溜掉了。也有时，狗儿在会场口转了一圈，拿出一支卷烟，坐在壁角的一只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听着那些年青的妇女谈着什么，无非这个长那个短；狗儿听得高兴，便哈哈大笑，一双手臂悬空拍着，好象鸭子在水里拍着它的翅膀。妇女们也不知道他笑些什么，只是觉得他有些讨厌，但又觉得他有些滑稽可笑。慢慢地狗儿和大家也都熟了，而且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在酝酿讨论并组的会上，狗儿还说了话，和他的妹妹一样也是拥护并组；因此，一些人觉得黄厚福的这一双儿女比他们父母的思想要开通得多。其实，狗儿和月英虽然都拥护和狮岭互助组并组，但是两人的想法不一样，狗儿有狗儿的想法。狗儿觉得父亲如果仍旧继续单独办一个互助组，噜噜苏苏的事情一定很多，少不得会麻烦到自己身上；再说和狮岭互助组合在一起，有很多好处呢，这也是一个很自然地可以和沈瑞珍接近的好机会。狗儿这些日子来，已转上了这么一个念头。

真的，自己一直都还没想到，总是因为这些年事情太多，

父母也没有替自己作个主。狗儿开始想起了自己的婚姻，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二十二岁，有些人在这年纪已经抱了儿子。“想不到从前象乞儿似的女孩，是这么能干的。”狗儿一下想到了沈瑞珍，“而且，人品还竟这样出色！”这时，狗儿仿佛又看到了沈瑞珍：中等个子，黝黑色的小圆脸孔，一双眼睛黑黑的象水一样透明，立在主席台前对大家说着话；说着，说着，她那双眼睛不时地向四周巡视，好象在问：“嗯！我的话说得对不对呢？”

“能够讨着这么一个女人也不差！”狗儿想着，“不但会做活……可是，人家还是一个团员呢！”狗儿不觉叹了一口气。吃过夜饭，狗儿还照样坐在长藤椅上，然而心里有事，在家里觉得坐不住了，总想走出去，到村子里开会也好，只要能够碰到沈瑞珍谈点儿什么。可是这个沈瑞珍，很难得碰到她独个人，总是和好几个女孩子在一起；再呢，这个十八岁的女孩，看去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神色，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自己还比她大四岁，狗儿反觉得有些怕她，也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接近她。

这一天，父亲大早同生产队一起到六和塔挑肥料去了。狗儿一直还没有参加任何工作，这个工作他更不会参加。挑肥料，是又脏又臭的苦差使，不仅狗儿这么想，黄厚福也不要儿子去做，认为这是一个下贱的工作，会委屈了儿子。狗儿知道妇女们不会参加挑肥，有的上山斫茅柴去了，有的在屋子里料理家务。吃过早粥，狗儿在自己屋前荡了一圈，想了想，便往村子里走去。刚刚上了沈家岭的石级，望见沈瑞珍在门口洗衣服，狗儿正愁着一直没有机会接近，今天碰巧只有她一个人，可不正好和她说话！一边走，心里却还有些胆怯。“人家从前穷得象乞丐，”狗儿想起对方和自己的身分来了，“虽然分到

了茶地和房子，家底怎么能比得上我们呢？我家的茶地比他家多，房子呢，也比他家大。再说，她早晚总得嫁人；嫁人嘛，她能嫁到哪里去呢？她还能找到什么好对象呢？要不然，莫非她守着那点茶地、房子和她的哥哥，过一辈子老处女生活吗？就算是一个青年团员，青年团员也要嫁人呵！……”这么想时，狗儿不但觉得自己非常有把握，甚至以为除了自己，沈瑞珍其实也再找不到比自己更合适的男人做丈夫了。

狗儿上了岭，向沈瑞珍家门口走去。

“瑞珍倭姊！”狗儿用着一个轻浮的口吻喊了一声“瑞珍阿姊”，把个阿姊的“阿”字轻薄地喊成一个“倭”字的音。

“天气这么冷，还洗衣服？休息休息，我来帮你洗！”狗儿一边说，一边走进堂屋，俯下身来。

沈瑞珍开始没有理睬他，看见狗儿跨进堂屋，走到自己跟前俯下身的时候，便立了起来，说：“狗儿叔叔，你有什么事情，请赶快说吧。没有事情就请你回去吧！”说着，走出了堂屋门，站在屋檐下再不出声了。

狗儿跟出了堂屋，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又怕沈瑞珍的这些话和这副神气给邻舍和过路的人听到，看见时罕奇，十分心虚，就说：“我是来找你谈谈的，你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客气呀？连坐也不请人坐一坐，一开口就叫人走。唉，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哪！”

“你要谈什么呀？你把人比狗，是什么意思呵？”沈瑞珍转过头来，望着狗儿说。“我可是没有工夫和你闲谈，你有什么话找领导去谈吧，或者到组员大会上去谈！”沈瑞珍看见狗儿跟出来，心里很着急，涨红了脸孔，说。

狗儿受了一顿抢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沈瑞珍家的屋前，慢慢地回下岭来。狗儿心里也说不出是气愤还是难受，正在茫然

地走着，一阵清新的孩子的歌声好象早晨的鸟叫一样，送进狗儿的耳朵，给茫然的头脑注入了清醒的药剂似的。狗儿抬起头来，找寻那歌声，从竹篱笆外边，望见狮岭小学的一大群男女小学生，正在操场上一边跳着集体舞，一边唱着：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朋友，
鞠个躬来行个礼，
独法米兰，
独法米兰，
独独独。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朋友，
笑嘻嘻来握握手，
独法米兰，
独法米兰，
独独独。

狗儿感到一阵难过，好象身上的什么地方挨了打一样。就是挨打也还没有这么难过，哪里挨了打就揉一揉，过一些时痛也就消了；这一阵难过却不是一下子就会消去的。

“你总住在这个村子里，跑不到哪里去！”狗儿还是无法不想到沈瑞珍，虽然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她总还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那我也总还有办法！”狗儿劝慰着自己，并没有死心，仍然充满了幻想。